

近代皖人话国是小丛书

王茂荫 与咸丰币制改革

张成权 · 著

黄山书社

近代皖人话国是小丛书

F822.9
Z085

王茂荫

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章

制改革

张成权 著

F822.9
Z085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张成权著.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12

(近代皖人话国是/陆勤毅、汪建国、诸伟奇主编)

ISBN7 - 80707 - 097 - 8

I. 王… II. 张… III. 货币改革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610 号

本书出版得到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资助

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

张成权著

*

责任编辑 李霜琴 审订 诸伟奇

责任校对 李霜琴 封面设计 国亮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82 千字 印数 1,5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707 - 097 - 8

定价 11.00 元

凡发现本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近代皖人话国是小丛书

编纂工作委员会

主 编

陆勤毅 汪建国 诸伟奇

编 委(以姓名笔划为序)

汤奇学 李霜琴 吴春梅 汪建国 张汉东

张成权 张曦仲 陆勤毅 赵 明 赵国华

施立业 翁 飞 诸伟奇

总 序

在中国历史学界,近代的范围,一般认为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迄于“五四”运动以前。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变的时期:外敌入侵,内乱频仍,清王朝从千疮百孔下的表面繁荣走向内外交困的全面衰落,终至灭亡;同时,西方文明源源涌入,各种思潮斑驳陆离,有识之士冀盼变革,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万象杂陈、新旧代谢的态势。中国向何处去?救亡图存乃至革故鼎新的路在哪里?在尘埃落定的今天,答案早已显而易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多少仁人志士,曾为此而艰难地求索、奋斗,流血、献身。在曲折坎坷的近代历史进程中,曾涌现出多少卓尔不群的人物,他们创榛辟莽,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

实业等诸多方面打上鲜明的印记,或创造了辉煌和不朽,或留下了失败和无奈……“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论其当时是非功过如何,他们对历史的作用和影响都清晰可辨;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损益互见,然而正是这种丰富和驳杂,更有助于形成今天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辨。鉴往而知今,读史以明道。加强近代史的学习,不仅有益于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通过对前人治国实绩的总结、分析,对前人艰苦思辨的探索、比较,无疑亦有裨于当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建设。为此,我们打算编纂一部能体现上述想法的小丛书。众所周知,安徽这块土地上,在近代曾产生过一批杰出的或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具体情况虽异,历史评价虽殊,但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实绩,却对近代历史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生命的节律曾经不同程度地牵动了近代史的进程。基于此,我们决定编纂《近代皖人话国是》这样一部丛书。当然,其中也有彰显本省历史文化等比较功利的目的。不过,主要的还是为了读史明道,古为今用,即朱熹说的:“读史当观

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十一)

写到这里,作为序来说,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因本丛书卷首不列“凡例”,所以下面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凡例”的内容:

先释书名:1、“近代”:如上所言,指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一历史时期。此前、此后的内容亦有阑入,皆依主人公主要生活时期而定。2、“皖人”:包括当时和现在的安徽省行政区划中本籍和寄籍人士。3、“话”:议论;主张,政见。作为子目书名用字,可选择用“谈”、“论”;也可以选择“与”,如“吴汝纶话教育”、“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还可以在此意旨下重新拟题。4、“国是”:国家大计及相关议题。

再说体例,实际上是对编撰的要求,主要有:选材要精,以主人公对当时的带全局性的焦点问题的论述为中心;资料要真实,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搞“戏说”;要通俗,本丛书主要面向非专业的读者,要体现学术性,但不采取学术论著的形式,有条件的尽量做到图文结合;因为本书的特殊形态,应注意将史(史实,包括主人公所论)与论(编撰者的阐发)尽可能区分开

来,防止读者误以编撰者的阐发为史实。在丛书的编纂凡例中还有几条,但多属编刊技术性要求,此不赘述。

本书的编纂,得到了安徽大学、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的重视和支持,特此志感。

《近代皖人话国是》小丛书编委会

2005年7月15日

自序

这是一本试图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事件的小册子。人物是王茂荫，事件是咸丰年间的币制改革，所以取名为《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看，王茂荫一生最值得一提的事，恐怕就是他在咸丰年间首倡发行纸币。但道、咸年间讨论货币问题的人很多，提倡发行纸币的也不只王茂荫一人，而且他提出的纸币发行方案并未被清政府采纳，实际推行的货币措施恰恰是他所反对的。那么，为什么惟独王茂荫能够名垂史册，人们至今还在纪念他？

这当然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他有关系。王茂荫提出将清政府发行的两种纸币（户部官票、大清宝钞）改为可兑现纸币的建议，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被马克思看作是关于货币理论和历史的“新材料”引进了《资本论》。这既使马克思关于货币史的结论在东方世界得到印证，也使王茂荫得以广为人知。

但也不完全如此。王茂荫与同时代讨论货币问题的学者、官员对货币问题的关心，可能出于同一个原因：财政困扰；但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他没有仅仅把货币问题看作是财政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同时从社会、文化角度，从关心民生角度看待和思考货币问题。他希望把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统一起来，而且要求国家制定货币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利益，至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这就是他所说的“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

国,方可以议立法”。王茂荫的货币主张也因此而显现出浓厚的民本色彩。关心人民的人,人民终究不会忘记他。

王茂荫能够为人们所钦敬,还在于他的人格风范。他以“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为座右铭,在歙县会馆里,孑然一身、粗茶淡饭度过三十余年的京官生涯;他进言论事,惟求其当,而不“以利害之见存于心”,在当时就获“直声清节”之誉;他勘破名利关,不追求生前之利,以“做人须从取舍上起”为行为准则,也不追求身后之名,反复嘱咐后人:不要刻印他的诗文,否则以“不孝论”,“行状”是“无用物”,也“无庸作”,即使是“颇费苦心”的奏折,也只可传家而不可传世。不求名的人,却往往会赢得生前身后的赞誉。

早在1991年参与点校《王侍郎奏议》时,我就对王茂荫油然而生景仰之情。但当时只是对他的货币主张进行了轮廓式的勾勒,而没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介绍他的为人和为官。写了《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这本小册子,则可大体上遂了当年的心愿。这里,要感谢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的诸伟奇教授,从《王侍郎奏议》的点校、出版,到这本小册子的问世,诸教授都给予了很大帮助。同时,也十分感谢李霜琴博士,这本粗糙的小册子让她费了不少心力。

今年值王茂荫逝世140周年,谨以《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这本小册子作为纪念。

张 成 权

2005年元月10日

目 次

自序	1
----------	---

一、从马克思说起	1
----------------	---

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资本论》的一条注释
使王茂荫重受关注——马克思为什么会关注王茂荫？——王茂荫事件传出国门——“Wan - Mao - in”译回中文的过程——王茂荫研究回顾——关于本书

二、走出皖南山村——王茂荫传略	21
-----------------------	----

家世——教育——入仕——歙县会馆——治学——仕途徘徊

三、首倡“行钞币”	45
-----------------	----

第一份“行钞币”奏折——对咸丰皇帝求言诏的响应——“行钞币”：王茂荫对解决财政问题的选择——王茂荫的纸币方案——王茂荫拉开了币制改革的序幕

四、“铸大钱”：币制改革开始实施	66
------------------------	----

铸大钱：币制改革开始实施——大钱——“钱荒”——添铸大钱——混乱的货币市场——盗

铸——添铸大钱的收场	
五、咸丰纸币的出台	88
户部对“行钞币”的否定——户部对纸币态度的松动——银票章程的制定与银票的发行——王茂荫对发行银票的异议——“大清宝钞”的发行——银票与钱钞	
六、短暂的户部右侍郎	108
破格擢升——建议改革科举考试——中枢的人事调整——王茂荫面对的人际环境——问题重重的官票、宝钞——与祁寯藻分歧公开化——咸丰皇帝的“严厉申斥”——真正激怒了咸丰皇帝	
七、纸币发行理论	138
“货币发行理论”——流通：纸币价值的实现——“以实运虚”：纸币运行的保障机制——宏观控制——货币供给主体的拓展——与货币名目论的分歧——民本思想	
八、“信为国之宝”	156
信用：纸币流通的保证——国家信用与货币信用——商业信用与货币信用——王茂荫是商人代言人？——货币信用与社会信用——信用：货币的本质——货币信用的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178
附录：王茂荫年表	180

一、从马克思说起

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资本论》
的一条注释使王茂荫重受关注——马克思
为什么会关注王茂荫？——王茂荫事件传
出国门——“Wan - Mao - in”译回中文的
过程——王茂荫研究回顾——关于本书

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

在清朝的咸丰年间(1851 - 1861)，中国出了一位货币改革家。他便是安徽歙县的王茂荫。

1851年10月26日(咸丰元年九月三日)，王茂荫向咸丰皇帝递上一份奏折——《条议钞法折》。这是王茂荫(也是咸丰年间)第一份建议发行纸币的奏折。王茂荫奏上这份筹划已久的奏折，虽然主观上只是想为舒缓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贡献一份忠荃，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份奏折，使他登上了咸丰时期混乱纷扰、危机日重的财政舞台，并以主张发行纸币而名垂史册，直到今天还被人们称为货币改革家。他可能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也正是这份奏折，拉开了咸丰年间币制改革的序幕。

咸丰年间所实施的币制改革，如果从王茂荫奏上《条议钞

法折》算起,到1861年(咸丰十一年)结束,正好贯穿了咸丰朝的始终。但是,这场延续了长达十年时间的币制改革,却常常被忽视了,以至于在中国通史以及清代断代史的著作中,不是略而不提,就是语焉不详。它几乎被淹没在对咸丰朝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详细叙述中。

其实,咸丰年间的币制改革,在晚清的历史乃至整个清代的历史上,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这场币制改革之所以值得重视,首先在于它从币制角度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成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一部分,也成为清王朝社会经济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同时,币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货币是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以后的三大发明之一^①。币制的变化可能是由经济原因推动的,但是,影响币制变化的因素和币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何况咸丰年间的币制改革还有着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进行冲击的背景。

咸丰年间的币制改革是以发行纸币和大面额铸币为主要内容的。这些货币形式今天只是货币收藏家们的藏品,但在发行它们的当时,却确实意味着在进行一次币制的改革。这是一次体制内的、被动的币制改革。

我们之所以把当时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措施称之为改革,是因为这些措施打破了清王朝自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起190年来货币形式固定不变的局面,大钱、纸币这些长期没有采用的货币形式成为流通货币,带来了货币体系的巨大变化。货币形式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换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等职能,但是,不同的货币形式,在实现这些职能的程度和有效性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对社会经济发展或阻碍的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次体制内的改革,是因为这次币制改革,虽然使货币体系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形成了多种货币形式杂陈的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既有的财政框架和货币格局,更不是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它只是在原有货币体系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措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它不是一次制度性的创新。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被动的,是因为这次币制改革,完全是在清王朝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压力之下被迫进行的。财政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前朝(即道光朝)所继承下来的财政支绌的局面,鸦片战争以后的巨额赔款、白银外流以及由此而加剧的“银荒”,使咸丰朝的财政从一开始就蒙上无法摆脱的阴影;一是为防堵太平军所花费的无底洞般的军费。这两项开支,再加上黄河治理、官员薪俸等其他正项和非正项的财政支出,以及战争所导致的赋税减少、铜斤短缺,把清王朝的中央财政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为了应付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内外的臣工们纷纷提出铸大钱和行钞币的建议,使咸丰年间的货币形式五花八门。银票、钱钞等纸币与各种币材、十余种面额和大小不等的金属铸币并行,一时间,各种货币形式杂沓纷纭,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货币奇观。

尽管我们把咸丰年间所采取的各项货币措施叫做币制改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的完全肯定。它从出台到终结,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向人民转嫁财政危机的实用主义倾向。在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支配下所采取的货币措施,必然很难顾及它的长远效应。用“饮鸩止渴”、“剜肉补疮”来形容咸丰年间所采取的那些短视的货币措施,是恰当的。实际上,改革币制不仅没有考虑到它的长远效应,连眼前的可行性及后果也没有充分估计。所以,这场币制改革很快就因为在实践中

不断碰壁而收场。随着咸丰年代的结束,大钱和纸币也停止使用,咸丰年间的币制改革不得不宣告终结。

咸丰年间实施的各项货币措施与王茂荫没有直接关系,都不是出于王茂荫的建议。但在当时沸沸扬扬的关于货币的议论中,最值得注意的却是王茂荫的意见。只有王茂荫提出的纸币主张及其具体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较为切实可行。王茂荫的货币主张还表现出理论的意义,它体现了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独特形态,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货币思想所能够达到的水平,构成了中国经济史、货币史上的重要篇章。

王茂荫的货币方案虽然被朝廷否定了,但是,清政府还是擢升他为户部右侍郎,兼管户部钱法堂事务。然而,王茂荫作为主管中央财政的大员之一,却对咸丰年间所采取的几乎所有的货币措施都给予了批评。他终于因为直言进谏激怒了皇上。担任户部右侍郎仅仅几个月时间,王茂荫就被调离了户部。从此,他失去了在货币问题上的发言权。作为咸丰年间发行纸币的首倡者而一度颇为人们注目的王茂荫,连同他的货币主张,很快地就在历史上沉寂了。

曾经被历史遗忘过的王茂荫以及他的货币主张,之所以会在今天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却要从马克思说起。

《资本论》的一条注释使王茂荫重受关注

打开《资本论》这部鸿篇巨制的中文版,在第一卷的第146到147页可以看到,马克思写有一条标号为③的注释。王茂荫的名字便赫然出现在这条注释中。据说,他是在《资本论》所提到的680多位世界各国人物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马克思在这条注释中这样写道: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阿伯尔博士和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②

当然,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王茂荫的名字是德文的音译,写作“Wan - Mao - in”。

这条注释是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C)铸币。价值符号》这一节中的。马克思在这一节中讨论的是从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中产生国家强制性纸币、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中产生信用货币的问题。马克思说,由于金、银等金属铸币的金属含量是由国家的法律规定的,而这些金属铸币在流通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磨损,这就逐渐地使金属铸币所具有的流通职能与它们的实际重量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货币上所标明的价值与它们的价值实体分离了,使货币演化成为价值符号,从而使“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马克思在分析了金属铸币由于在流通过程中的磨损而使它成为价值符号并由此使纸币有了产生的可能之后,接着写到: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
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
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
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
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
付手段的职能。^③

就在这段文字之后,马克思加了上述标号为③的注释。